

2024年6-7月《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

对时代经验的敏锐捕捉

□胡诗杨

2024年6月以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中国作家》陆续推出了新刊。其中既有陈建功、刘庆邦、徐小斌、周晓枫等著名作家带来的新作，也有青年作家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捕捉。我们能从中观察到写作者们对于文学母题的回归，也不难发现一些新的文学趋势的出现。这些新作品的亮相可以看作对时代经验的一次总结记事。

记忆长河里的寻根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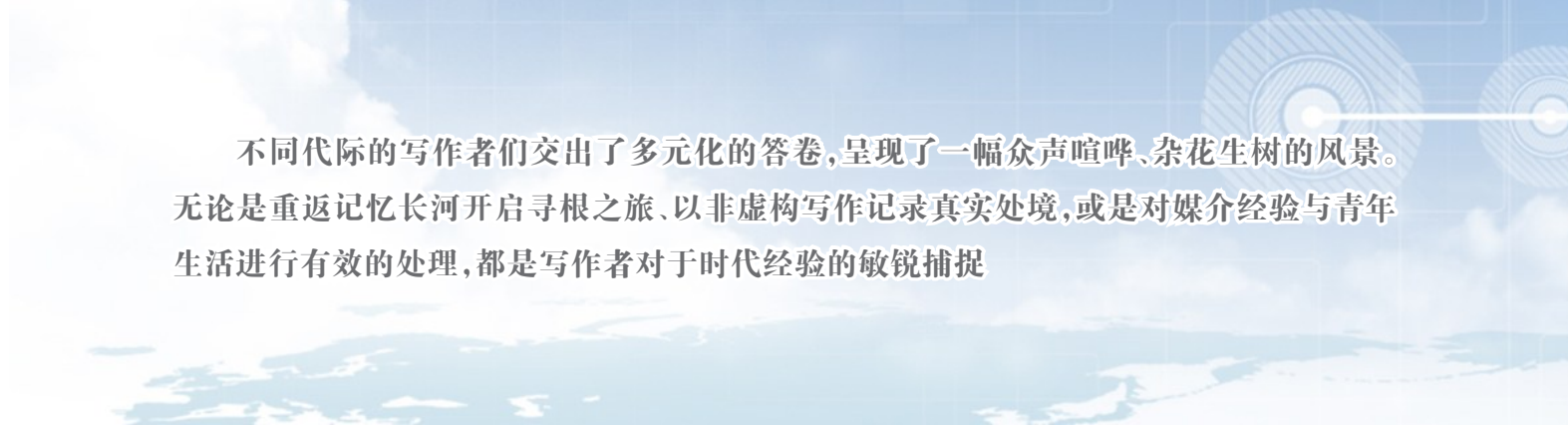
写作者如同记忆长河的“摆渡人”，在私人回忆、家族秘史、共同体记忆中厘清人的来路与归途。寻根，可以是寻自我之根，也可以是寻家族之根，或民族之根。在记忆深处寻根，是近年来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

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3期）从初唐时期李世民的御用画师起笔，状摹了一个非图腾化的敦煌，也唤醒了历史深处的集体记忆。基于史实的虚构与想象营造了磅礴宏大的气象，而盛世来临前普通人的爱恨情仇则细腻婉约，在斑斓壁画中留下了一段史诗。

张继的长篇小说《驴的喜剧》（《中国作家》2024年第7期）以一头驴的落水环环相扣牵引出了乡村社会的一张生活网，世态人情、生计烦恼、权力关系、爱情悲欢在生动鲜活的讲述下相映成趣，富有十足的烟火气。

家族与乡村是文学寻根之旅上难以绕过的路标，其中的“常”与“变”耐人寻味。孙频的中篇小说《截盆往事》（《十月》2024年第4期）借孩童之眼徐徐铺展开了一个关于复仇、宽恕与和解的故事。在蜿蜒的河流与迷雾四起的截盆盆地中，父亲的生死簿铭刻着世仇，悬而未决的往事谜团无不牵动着村民的当下生活。周瑄璞的短篇小说《扎灯山》（《人民文学》2024年第7期）从过年期间的扎灯传统起笔，将乡村内部各个家庭的心事一一散开，并在两次募款中刻录现代乡村观念的新变与风俗人情的恒常不变。

写作者从公共记忆的上游寻根，也在私人记忆中顺流而下找寻精神世界的锚点。在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一只白鸭》和《白玉少女》（《十月》



不同代际的写作者们交出了多元化的答卷，呈现了一幅众声喧哗、杂花生树的风貌。无论是重返记忆长河开启寻根之旅、以非虚构写作记录真实处境，或是对媒介经验与青年生活进行有效的处理，都是写作者对于时代经验的敏锐捕捉

2024年第4期）中，带有恒久性的美成为溢出生活的一抹亮色，默默见证着北京城的变迁以及岁月的更替。作为专栏“逆旅人间”的第二期，梁鸿的散文《收纳痛与爱》（《当代》2024年第4期）聚焦于医院相关的疼痛与爱意交织的记忆，写下世情冷暖与人生百态的切肤体悟。

童年是每个成年人的生命底色，追寻童年记忆也就是在追寻自我的来路。在《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中，周晓枫、殷健灵、周敏三位作者为童年生活提供了多种书写的路径。周晓枫的童话新作《小酒窝》关注到梦境这一潜意识题材，以丰沛的想象力讲述了一个造梦精灵的冒险之旅与成长顿悟，引发人对梦与理想的哲学思索。殷健灵《少年仰起他的脸》将关怀之手伸向一个患有家族遗传病症的少年，在历经成长的阵痛、艺术的洗礼、亲友的善意后收获了赞美与幸福。周敏《胡同也有小时候》将故事设置在了北京胡同里，讲述了视频制作者、民间手艺人等普通人的生活姿态，将天真童趣融入了地道的京味京腔之中。

在非虚构写作中辨认真实的处境

如何坚持对“真实”的承诺，是文学写作中的重要问题。自《人民文学》杂志2010年第2期开设新栏目“非虚构”以来，“非虚构”这一文类在国内文学期刊中开辟了一片天地。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梁鸿的“梁庄系列”、范雨素的《我是范雨

素》、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等都是非虚构写作的丰富成果。

忠于个人经验式的呈现是非虚构写作的一大优势。陈建功的长篇小说《我们脏的时候》（《北京文学》2024年第6期）以自嘲反讽的口吻回忆了18岁到28岁（1968年到1978年）在京西木城洞煤矿当矿工的十年生活，在跨越四十余年的记忆追溯中剖白个人命运在时代浪潮下的翻涌，“新我”与“旧我”的周旋与直面灵魂的文学启迪。

非虚构写作对于当下现实处境的捕捉往往是敏锐的。袁凌的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3期）与具有劳动者和文学创作者双重身份的“皮村文学小组”工友们进行了一场深入、平等的对话。作者描绘谋生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关系，体察皮村兄弟姐妹们对生活的细腻感知力与文学创造力，并对他们给予了温情的注视。程青的《成长记》（《中国作家》2024年第6期）脱胎于个人博客上的非虚构连载，以纪实的笔触记录了母子二人相处的生活点滴与成长启示，如时光相片般将美好瞬间一一定格，绘制了一幅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图鉴。

人与地的互相滋养也是非虚构写作者们常常关注的一个主题。厉彦林的长篇小说《齐风淄火》（《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从当下出圈的淄博烧烤追溯回千年前风起云涌的齐国春秋，在饕餮美食与精神盛宴中将山东淄博的历史娓娓道来。王琛的报告文学《北京民办博物馆人印

象》（《北京文学》2024年第7期）聚焦于民间文物收藏，勾勒了复夏博物馆的马未都、紫檀博物馆的陈丽华、老爷车博物馆的维文有这几位博物馆人三十余年的生命轨迹。余艳的报告文学《书香里·清溪人》（《青年文学》2024年第6期）围绕作家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清溪村，记述了当地人人为打造“中国文学之乡”、吹响新乡巨变的号角所进行的文化探索。

媒介经验与青年生活

《当代》2024年第4期开设的新栏目“笔谈”首期刊载了日本青年女作家朝吹真理子与中国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通信，信中二人回忆了2023年在绍兴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上的相识，并进行了文学写作与生活方式的一场对话。两位青年作家的对话既传递出了友好的跨国情谊，也带有青年写作的朝气，不禁引人思考青年生活如何在当下找到恰切的表达。

在文学写作中有效地处理青年经验与时代经验，是一项有难度的挑战。写作者们或是将具有时代感的元素缝合进文本，或是尝试捕捉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为“进行时”的生活起到总结记事的作用。老冕的长篇小说《饿兔子跳》（《当代》2024年第4期）围绕女大学生海岛离奇失踪案展开了一个悬疑感十足的故事。作者巧妙地将社交媒体上的虚拟身份、软件随机生成的网名、个人隐私与监控视频所引发的公共讨论融入小说

叙事，在生死一线的氛围中对于人性的幽微、自我的救赎、女性的现代处境进行了洞视与反思。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电影与文学的互动也成为了当下写作者关注的话题。徐小斌的中篇小说《芭提雅——一部电影的诞生》（《当代》2024年第4期）鲜活地还原了一部中外合拍电影台前幕后的制作过程。目睹了一幕幕高潮迭起且具有异域风情的曲折场面，两位身处复杂影视圈的女主人公不禁发出对艺术创作初心的灵魂追问。

对于青年作家而言，“夜晚”相对于白昼天然地带有“逃离”属性，他们常常会选择“夜晚”作为切入点，关注隐秘角落里青年人的心灵微澜。杜梨的中篇小说《三味真火》（《当代》2024年第4期）别具生猛的时代气息，女主人公是一个自闽南而来的北漂女孩，白天在奶茶店打工，晚上做嘻哈歌手，夜晚成为了她地下身份的收容所。小说以鲜明的女性视角重新打量原生家庭的阴影，在时髦的说唱歌词、与《西游记》的互文之中展现了叛逆张扬的青年精神状态。邓安庆的中篇小说《夜曲》（《青年文学》2024年第7期）把追光灯照向夜晚城市角落里两颗孤独的灵魂，写下他们的互相取暖与互相疗愈。

《北京文学》的“新北京作家群”栏目推出了辽京的短篇小说《肾上腺素》（《北京文学》2024年第6期），小说有关一段年轻爱情的终结，青年恋人在游乐场的过山车上温习相识的记忆、经历告别的仪式，也在时代的过山车上攀升与下落，作者敏锐捕捉到了肾上腺素退潮后的时代情绪。《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3期中，李洱主持的“创意新力量”栏目推出了钱辛的《天乐》和东楼的《周围有人走动》这两位新锐作家的创作成果，在生活切片中写出对个体自由的探索。新鲜面孔的亮相为青年写作持续注入着活力。

观察各大文学期刊推出的最新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不同代际的写作者们交出了多元化的答卷，呈现了一幅众声喧哗、杂花生树的风貌。无论是重返记忆长河开启寻根之旅、以非虚构写作记录真实处境，或是对媒介经验与青年生活进行有效的处理，都是写作者对于时代经验的总结记事，结下的绳会在未来回望时成为发光的路标，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作快评

王莫之中篇小说《忘不了的你》《上海文学》2024年第6期

聆听时代曲

□汪芦川

王莫之的中篇小说《忘不了的你》（《上海文学》2024年第6期）讲述了20世纪上海音乐人徐伟升、梁曼音的“时代曲”故事。怀揣歌星梦想的徐伟升和音乐人李染、老言等人结识，因自己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徐伟升将梦想和爱情都投给了结识的女歌手小秋，并帮助小秋成为了一代歌星梁曼音，小秋也因此成为了伟升心中“忘不了的你”。王莫之首先是一位影评人、乐迷，其次才是一位作家。这样的身份使得他的文学实践似乎必然也是个人音乐理想的一部分。从《现代变奏》到《安慰喜剧》，王莫之一直坚持以某种自觉而清晰的聆听者特质书写声音的故事。唱片公司征选男女灌唱员，老言组建爵士乐队，伟升、小秋共组乐队，伟升为小秋写歌……小说中充斥着种种对声音事件的摹写与想象，这种听觉叙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不断发出声响的动态世界，与视觉叙事创造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似乎更为感性和立体，更具连续性与真实性。在此意义上，《忘不了的你》是一个不仅可以被阅读，还可以被聆听的运动着的过程，它允许我们去叩问种种在最终乐章出现之前的现象，聆听各种混杂的音响以及它们之间的拉锯。

近年来，王莫之的工作和兴趣一直是追踪、采访上海老音乐人，因此这篇小说似乎是其检拾“时代曲”研究的产物，也是《黎锦光的日本之行》《陈歌辛的版权悬念》等学术考据文章的副文本。写作《忘不了的你》时，王莫之轻快地穿梭于现实与虚构之间，将黎锦光、安娥、周璇等上海音乐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设置为能让读者会心一笑的意义节点，将铜仁路、国泰舞厅、愚园路、苏州河、泰山路、东方饭店等真实街景捻成一根根进入旧上海紧密世界的线头，小说因此产生了一种向历史与现实双向延宕的非虚构效果。王莫之以考证、恋物的目光长久注释唱片片芯、留声机、电影海报、男士皮包、水滑蛋等老旧物件，赋予它们可视性和可听性的

潜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和读者达成影碟时代的某种默契。这些零碎、多样、彼此不干涉的生活物件迸发于历史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有待读者和王莫之共同解码的“辩证图像”。

王莫之在写作时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能平视“攻占舞厅、电台，甚至成为有声电影的卖点”的时代曲的位置，甚至有意将故事的主题情节进行俗化、淡化处理。正如题目“忘不了的你”那样，整篇小说自带一种悠然自得、能融入一切烟火尘埃的平民精神。大历史的记忆在《忘不了的你》中面目模糊，仅仅是“时代曲”中偶尔幽浮的几个和弦。王莫之自觉地扮演起“收集者”或本雅明的天使的角色，在断垣残壁中挖掘或回顾一段属于个人的“非官方”历史。《忘不了的你》的叙事空间横跨上海50余年的历史，至少涉及了孤岛沦陷、太平洋战争、抗战胜利、上海解放、香港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面对历史和人生的种种震惊经验，故事的主角徐伟升、小秋等人却都在短暂的躁动后坦然、平静地接纳了它们。整篇小说因此也具有了某种微澜过后一切复归自适平静的美感。正如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比赛结束了，比的人，看的人，统统回去，买菜烧饭，擦面睡觉。”王莫之举重若轻地拨开历史、社会、超验秩序的枝蔓，切入到了人与生活本然、生命激情的对话。在此意义上，伟升的单恋故事就只是小说表层的躯壳。伟升长达半个世纪的付出和深情与其说投射给了小秋，不是说投射给了个人未竟的理想和无法休止的生命激情。在这种生命激情的作用下，爱、野心和遗憾轮番出场，又散落在伟升、小秋、老言等主要人物的连接关系中，激起一圈又一圈微妙的涟漪。因此，《忘不了的你》不只写给上海读者和“时代曲”爱好者，也写给能与这种生命激情共振的所有人。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评论

援藏人生的精神张力与诗意表达

——张国云《山海情》评析

□王学海

一个人与世界的尺度应该怎样去丈量，张国云的长篇纪实文学《山海情》（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范例。作者通过呈现浙江和全国其他地区三十年援藏的人与事，将自己对援藏工作的个体认识提升到国家整体高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本阅读体验。作者结合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考，让“援藏”成为一个鲜活而独特的词，充盈着时代生命力，行走在中国新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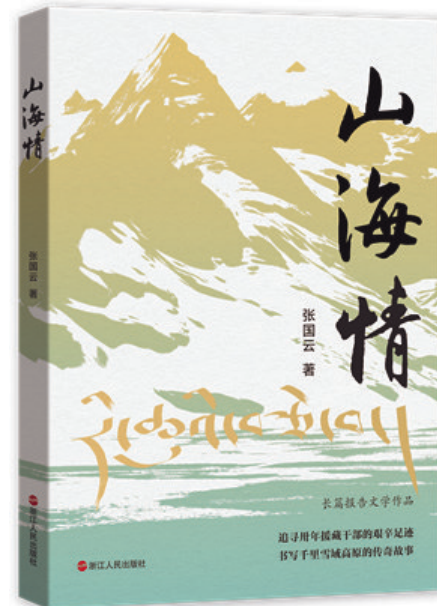
代的发展中。《山海情》在文学创作中的创新，在于彰显了浓浓的抗争精神，并时时描绘出时代发展的总纲。它赋予了纪实文学新的时代使命，让叙事技巧与文学修辞在新时代“援藏”语境中有了新气象。它以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叙事告知读者：发展西藏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以张家明、王军强为代表的众多援藏干部，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的英雄在时代的发展中谱写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山海情》在纪实事件的发展中以人物的刻画中，为我们构建起一个历史性的开阔的纪事空间。书中记录的事件有1994年开始的援藏，以及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八省市对口援藏，尤至历史上的文成公主“援藏”、唐贞观八年（634）冯德遐入藏“下书临抚”。作为一名浙江的援藏干部，作者不仅立足于浙江，还放眼全国进行叙述，从而让《山海情》的叙事格局更大。作者用精湛之笔，既写援藏又不仅仅只写援藏之事，在字里行间，让援藏工作在方方面面都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由此让读者明白了援藏不单单是支援性质的一种工作，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大工程。

作者以优美的文辞，记录了援藏工作中典型的人与事，其中尤以人物形象的刻画彰显“雪域高原儿女的血性”。在“生命禁区”里，作者以“活着就是贡献”为铺垫，突出了飞翔在4500米海拔的援藏雄鹰们，对“阳光与荒原”进行“再分配”，在“再分配”中引出“惊天动地的回响”。

《山海情》的文学叙事结构精巧，如《不长树之地长的“树”》中出现的一位援藏人物余风，说着“种下阳光，春暖花开”，让长树具有了人与物共生的生命动感。我们熟知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但“种下阳光，春暖花开”在雪域高原上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面朝大海的毕竟是一个旁观者，“种下阳光”的才是真正的耕耘者。在“藏北高原植此青绿”，这不仅是荒原长树，更是新时代中国建设者精气神在绿叶之上的一次激情的绽放。

有意义有价值的纪实文学，当然不仅有叙事的详实，还有善于抓住有闪光点的典型。《山海情》自然做到了这一点。在《生态搬迁》这一章中，作者先以1976年那场罕见的狂风，引出当时只有7岁的小女孩德卓，“她背着小口袋，跟大人一样，在狂风中奔跑，为牲畜找草”。然后，作者让羌塘以自然的野生状态“说话”，来告知阅读者，该正视的是野生这一自然状态。书中提到1911年陈渠珍带着150人误入羌塘，花了7个多月才穿过羌塘和青海的无人区，最后只有7个人生还，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荒野尘梦》一书。作者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无人区本来就不该是人类该去的地方，那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还是应该把那片地方留给野生动物”。作者的话，让我想起了加拿大彼得·G.布朗和彼得·蒂默曼写的《人类世的生态经济学》一书。书的开始就是：“我们应该朝着一条比当前命运轨迹更富有效率的道路前进。”我们的理想追求，必须要建立在现实的生态经济学的基础上，才不负于我们身处的这个发展的时代。所以，作者才会在《山海情》中睿智地写道：“牧民们对生态搬迁有了更加朴实的认识……生态搬迁，将给拆除网围栏创造条件。”作者进一步写道：“望着此情此景，梁楠都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牧民们第一次搬家走进无人区，是为了向自然要生活空间，人进草退。如今牧民们第二次搬家走出无人区，是为了还自然涵养人间，人退草进。”好一个“人退草进”！《山海情》不仅写援藏的人与事，还写出了藏



《山海情》，张国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族聚居区文明的历史性进步——人，确实需要给与人生活在共同天地下的动物一次温柔的呵护。

《山海情》是一部兼具纪实性与创新特色的长篇文学作品，它以援藏为主线，写出了援藏的主旨和藏地的需求，将一个援藏故事似珍珠般串连起来。《山海情》中凸显出来的人与事，勾勒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域性特色，并富有层次地彰显出人性的大爱光辉。作者并非非一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叙述的对象，投向了一份精神、一种现代文明的张力，从援藏这一艰难之行，引出了能载入史册的生命真谛。在文本的建构中，作者让真情流淌于创作之中，并向着援藏这一工程无限敞开。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原副主任）